

儿童社会工作者的儿童保护报告倾向^{*}

谈子敏 田甜 何雪松

摘要: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儿童社会工作者的儿童保护报告倾向,以及这种报告倾向与其专业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儿童社会工作者儿童保护报告的比例较低;报告倾向同儿童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年限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持证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更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性越高,报告倾向越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使命感越强,报告倾向也越强;在实施强制报告制度的城市中,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也更强。研究结果确认了儿童社会工作者儿童保护的报告倾向与其专业性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提供了相关依据。

关键词: 强制报告制度 儿童保护 儿童社会工作者 报告倾向

在中国,儿童虐待的发生率较高。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遭受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以及忽视的比例分别为26.6%、19.6%、8.7%和26%(Fang et al., 2010)。童年期遭受躯体虐待和性虐待与自我报告的吸烟、肥胖、酗酒、药物滥用、抑郁、试图自杀等明显相关;童年期的负面经历越多,健康危险行为也可能越多,成年后越有可能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骨折、肝病等疾病(Vincent et al., 1998)。因此,需要有效的儿童保护制度以及具有适当能力的儿童社会工作者对此给予回应。

儿童虐待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潜在的儿童虐待进行报告是实施儿童保护制度的前提。受虐待儿童缺乏话语权,需要由日常同儿童接触较多的相关人员承担报告责任(即强制报告责任)。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儿童遭受侵害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在中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紧迫性(何玲, 2015; 尚晓媛等, 2019)。但实践中却发现,相关人员主动报告的意愿并不高。需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保护受侵害儿童的权益(谢娜、蔡迎旗, 2017)。

2014年以来,我国相继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反家庭暴力法》中作出儿童相关职业的强制报告规定。2020年颁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了儿童相关职业的报告义务。在儿童相关职业中,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直接与儿童接触的社会工作者)具有较多机会发现潜在的儿童虐待情形,儿童社会工作者是具备强制报告责任的主体之一。然而,在承担强制报告责任时,儿童社会工作者并不一定对儿童虐待情形都进行报告。这会直接影响儿童保护制度能否有效发现需要保护的儿童。

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了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的相关数据,试图确认影响相关责任人是否报告的因素,探讨儿童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与报告途径、社会工作者专业性(professionalism)的关系,从而为有关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提供相应依据。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 强制报告制度与报告途径

国内对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讨论国外的相关制度实践上,同时还力图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灾害脆弱性视角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2020ESH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探讨实施这一制度的可行路径。尚晓媛、张雅桦(2008)提出,完善的儿童保护制度要具备四项基本要素:国家组织(或授权组织)的儿童保护专门机构、对揭示儿童虐待情形的强制报告制度、专门针对儿童保护情形的处理程序以及替代性的国家监护制度。其中,强制报告制度是国家对儿童虐待情形进行干预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有研究从强制保护的制度设置、参与者这两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从制度设置看,杨志超(2014、2018)比较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及其发展历程。他提出,在中国推行此项制度应基于“国家亲权主义”的原则,扩展国家在面对家庭内事务时的权责,从而确定报告责任的主体、扩展报告途径。在完善公安机关接受报告流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报告途径,增加接受报告的主体(如地方妇联等),提升报告率;报告责任主体应该是工作中同儿童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机构”,从而把责任落实到个人。从参与者看,对强制报告制度中的责任主体,除赋予其责任外,还应当使其在进行报告时权责对等(包括对报告人提供技能培训;对其身份信息保密;不追究误报、错报的责任等)(佟丽华,2019;杨志超,2017)。

基于此,本研究也尝试从制度设置和参与者这两方面考察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运行状态,提出相应建议。

从制度设置看,强制报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散布于各项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报告规范,另一方面是专门的强制报告制度。2014年以来,同强制报告相关的法律规范相继开始实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2014年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学校、医院、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侵害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2016年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而造成严重后果,会受到处分。

依照这两项法律规范,儿童相关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医生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实际上被赋予了强制报告的责任。这些专门的强制报告制度,连同2020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委共同颁布的《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强制报告制度,明确了报告的责任主体。不过,报告途径还仅限于公安机关,在可选范围以及便利性上明显受到限制。

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法学层面出发,讨论针对儿童虐待情形进行强制报告的必要性,以及在中国实施的可行路径。不过,强制报告制度从2014年就开始逐步实施,但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具有报告责任的相关人员在遇到相关情形时的报告倾向究竟如何等还少有实证研究。

(二) 强制报告责任人报告倾向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强制报告制度已实施几十年。不过,这项制度的实施目的与实施效果可能存在明显落差。一些研究分析了可能影响个人报告倾向的因素。根据分析,可以把这些因素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情形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报告者因素。

情形因素主要是指儿童虐待情形中的家庭与儿童情况。儿童遭受虐待的类型对报告者的报告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有明显外部痕迹的躯体虐待以及性虐待的被报告率高于精神虐待与忽视的被报告率;受侵害的儿童年龄越小,被报告的可能性越高(Flaherty et al., 2008);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被报告的可能性越高(Davidov et al., 2012)。^①

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强制报告制度法律条文的清晰与易用程度,以及机构对报告人的支持程度。研究发现,法律条文的规定越清晰(Brosig & Kalichman, 1992)、报告者所在机构提供的支持越充分(Flaherty et al., 2008),相关人员的报告倾向越强。但是,在有关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中,暂时还没有涉及报告途径对报告倾向的影响。

报告者因素主要是指报告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报

^① 情形相关因素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此不过多论述。

告,女性的报告率比男性高出6.1倍(Gunn et al., 2005; Kenny 2001)。原因可能在于,女性对儿童虐待更加敏感,同理心更强。也有研究(Ashton, 1999)发现性别和报告率之间没有关系。^①此外,还有研究(Rechard et al., 1999)通过对美国俄亥俄州公立学校教师的调查发现,男性更倾向于报告;不过,男性、女性的报告倾向差异并不大。

对职业护士的研究发现,报告者的年龄与报告倾向正相关;原因可能在于,越是熟练的护士,越能准确觉察到儿童的情感与生理状态(Fraser et al., 2010)。但对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的调查却发现,年龄与报告倾向没有关系(Ashton, 1999),这可能与调查样本较小(86人)以及在读研究生缺乏工作经验有关。对学校老师以及儿科医生的调查发现,报告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经验(Gunn et al., 2005; Kenny 2001)。也有针对学校心理老师的研究把其分为经验丰富组与经验有限组,结果却发现经验对报告倾向没有明显影响(Goldman & Padayachi 2005),这可能是分组方法的限制造成的(难以充分发现其中差异)。此外,一项在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裔幼儿园老师的研究发现,工作经验与报告倾向呈负相关(Haj-Yahia & Attar-Schwartz 2008)。对此的解释是,工作经验与年龄正相关;而在此地区年龄越大越传统,更不倾向于报告。

几乎所有研究都认为,不论工作经验是否丰富,专门的儿童虐待报告培训会显著提升报告倾向。更进一步来说,在认知方面,如果能够接受更多的儿童保护培训、了解更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程序,报告人会更加倾向对儿童虐待情形进行报告(Feng & Levine 2005; Gunn et al., 2005; Kenny 2004; Renniger et al., 200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人口统计学的相关因素(如性别、年龄等)对是否进行报告的影响并不明确;而认知相关属性(如学历、儿童保护培训等)与报告情形呈正相关。

(三)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

在现有研究中,对专业性的讨论常与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相混同。对专业性的讨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组织层面的专业性类似于专业化,聚焦组织对专业性的构建与控制;而职业层面的专业性则聚焦某项职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工作者职业层面的专业性(专业程度),探讨专业性与对儿童虐待案件的报告倾向的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工作者专业性的两个方面:专业资格(专业证书或专业学位)与态度专业性。其中,专业证书是指助理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资格证,这项职业资格证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直接关联(唐宁, 2019);专业学位也同样被认为同专业性有很大关联(Leighninger, 1978)。

有研究认为,专业行为与专业态度具有一致性(Hall, 1968),社会工作者的态度专业性会影响他们的报告行为。本研究选取工作自主性与专业使命感这两项体现态度专业性的因素进行检验。其中,工作自主性是指社会工作者可以不基于外界(包括机构与案主)的压力进行专业工作(Evetts, 2013);专业使命感是指社会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投入程度。

基于对现有研究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本研究着重分析这几个问题: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后,儿童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是否与他们的专业性相关(包括是否与社会工作教育背景及持有社工证相关;是否与工作自主性及专业使命感相关);儿童社会工作者进行报告时,是否遵循现有报告制度的要求,选择向公安机关报告。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华东理工大学2019年进行的“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hina Social Work Longitudinal Survey, CSWLS)。此项调查是全国首个以社会工作行业发展为主题的综合性调查,于

^① 不过,此项研究的对象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且样本量过小(86人)。

2019年6月至10月^①在全国56个城市进行;具体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部分城市(刘畅等,2020)。

调查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以每个抽取城市的注册社会工作机构名单为抽样框,随机抽取匹配数量的社会工作机构;其次,根据每个抽取社会工作机构的规模,随机抽取匹配数量的社会工作者。^②最后获得有效的社会工作者个人问卷5965份(不包括民政系统和医务系统)。

根据研究目的,仅分析填答过儿童社会工作问卷模块(即日常工作中与儿童直接接触)的社会工作者个人问卷(3514份)。在剔除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其中遇到(疑似)儿童虐待的社会工作者问卷即为本研究分析的有效样本,共有1371份。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儿童不正当对待情形时是否进行报告。其中,“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

2.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资格专业性”和“态度专业性”。

资格专业性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学历教育和专业证书。其中,“拥有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编码为1,“非该专业”编码为0,“拥有初级以上社会工作专业证书”编码为1,“无证书”编码为0。

态度专业性主要包括工作自主性和专业使命感。其中,工作自主性采用“工作内容量表”(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Karasek et al., 1998)进行测量。量表共有3个条目;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有意见”“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分为1—5;累计得分越高,表示工作自主性越高。量表的克龙巴赫系数为0.83。专业使命感采用自编量表。量表共有6个条目。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有意见”“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分为1—5;累计得分越高,表示专业使命感越强。量表的克龙巴赫系数分别为0.92。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等)和区域(发现报告政策)。发现报告政策是指问卷调查前所在地区是否颁布了发现报告政策或条例。其中,“已颁布施行的地区”编码为1,“未颁布地区”编码为0。^③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 基本描述性统计

表1是儿童社会工作者在遇到(疑似)儿童不正当对待情形时的报告倾向。从表1可以看出,在儿童社会工作者中,有39.02%(1371人)遇到过儿童遭受不正当对待的情形,但只有14.46%的人进行报告;报告比例相对较低,仅为遇到儿童不正当对待情形人数的37.05%。这表明,在儿童社会工作者中,强制报告制度并没有很好推行。

^① 在调查进行期间,2014年颁布的《监护侵害意见》以及2016年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2020年颁布的《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还未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对社会工作者已有强制报告的要求,但还没有系统全面的强制报告制度。

^② 当所抽取的社会工作机构中社会工作者人数不足10人时,按照匹配规则,该机构的全部社会工作者均被抽取。

^③ 在调查的56个城市中,在2019年6月前出台过地方性强制报告政策的只有6个城市,分别为南京、无锡、杭州、昆明、广州、武汉。

表 1 是否遇到过儿童遭受不正当对待的情形

报告倾向	频数	百分比(%)
遇到过,向相关机构进行报告	508	14.46
遇到过,没向相关机构进行报告	863	24.56
没遇到过	2143	60.98
合计	3514	100.0

表 2 是儿童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选择的报告对象(包括机构和人)。在选择遇到过(疑似)儿童不正当对待情形并进行报告的 508 位社会工作者中,共有 485 位回答了此问题。从表 2 可以看出,超过 50% 的社会工作者向本机构的督导或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报告,只有 9.69% 的社会工作者向警察进行了报告,还有 12.37% 的社会工作者向所在社区或所在村委进行了报告。此外,有 7.22%、7.01% 以及 6.19% 的社会工作者分别向民政及下属街道、教育部门以及妇联进行了报告。^①

表 2 社会工作者选择的报告对象

报告对象	频数	百分比(%)
督导(机构)	260	53.61
警察(司法/110)	47	9.69
政府(民政/街道)	35	7.22
教育部门	34	7.01
父母	14	2.89
非政府组织	1	0.02
社区(村委)	60	12.37
妇联	30	6.19
团委	2	0.40
医院	2	0.40
合计	485	100.0

(二) 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采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

表 3 是儿童社会工作者报告倾向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的大多数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婚姻状况等)与报告倾向并没有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年限越长,报告倾向越强;相反,社会工作者的年龄越大,报告倾向反而越弱。^②

^① 限于篇幅,实际进行报告的 1371 位儿童社会工作者个人特征的描述性结果此处略。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一般来说,年龄与工作年限成正比。所以这一发现表面上看似矛盾。但是,在对两个自变量进行分析时都对其他自变量进行了控制。也就是说,同样年龄下,工作年限越长,越倾向于报告;而同等工作时长下,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报告。这也与文献回顾中以色列及美国的研究发现形成对照。相对来说,同等工作年限而年龄越大的社会工作者对儿童虐待的认知与严重程度的判断可能更低,不倾向于介入他人的家庭事务。因而,他们的报告倾向反而更弱。

表3 报告倾向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95% 置信区间	
工作自主性	0.056 [*]	0.034	1.65	0.099	-0.010	0.122
专业使命感	0.032 ^{**}	0.016	2.05	0.040	0.001	0.063
满意度	-0.003	0.079	-0.04	0.972	-0.157	0.151
证书(参照项:无社工证)						
有社工证	0.453 ^{***}	0.138	3.28	0.001	0.182	0.723
专业背景(参照项:非社工专业)						
社工专业	-0.019	0.137	-0.14	0.889	-0.288	0.250
工作年限	0.123	0.022	5.72	0.000	0.081	0.165
报告政策(参照项:无报告政策)						
有报告政策	0.521 ^{***}	0.180	2.90	0.004	0.169	0.873
年龄	-0.039 ^{***}	0.012	-3.32	0.001	-0.062	-0.016
性别(参照项:男性)						
女性	-0.033	0.142	-0.23	0.819	-0.311	0.246
婚姻(参照项:未婚)						
已婚	-0.024	0.150	-0.16	0.874	-0.317	0.270
其他	0.352	0.504	0.70	0.486	-0.637	1.340
常数项	-1.429 ^{**}	0.591	-2.42	0.016	-2.588	-0.270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从资格专业性看,持证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更强;是否接受过社会工作学位教育与报告倾向并无显著关联。根据《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以及《助理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是否选择报告(疑似)儿童虐待情形既不会影响参与社工师考试的准入资格,也没有把它们纳入考试内容。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与其是否具有社工师职业资格证书并没有内生性联系。引入年龄、工作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些因素与获得专业资格有强关系。

从态度专业性看,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性程度越高,报告倾向越强;专业使命感越强,报告倾向也越强。由此验证了有关态度专业性与专业行为关系的假设。对儿童社会工作者来说,更强的态度专业性会在报告儿童虐待情形方面更为负责,能够更好地保障他们所服务的儿童群体的权益。是否具有社会工作学位与报告倾向并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并不符合一般认知,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政策环境方面,在制定强制报告政策的6个城市中,儿童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更强。

四、结论、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考察了儿童社会工作者遇到儿童虐待情形时是否进行报告,以及报告对象的选择等;发现了社会工作者个人因素与其报告倾向的关系。基于这些初步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讨论如何提高儿童社会工作者的虐待情形报告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制度强制性与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

社会工作者的态度专业性(包括工作自主性与专业使命感)使其更倾向于进行报告。不过,实际上进行报告的比例并不高。这表明,制度层面的“强制性”还只是停留在法律与政策层面,并没有对社会工作者进行报告起到真正的激励和支持作用;还需要依靠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专业性水平来决定是否进行报告。此外,社会工作者的报告率较低还表明,强制报告制度并没有真正有效推行。

从制度设计看,《监护侵害意见》和《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关强制报告要求的条款缺乏罚则;也就是说,即使不按照要求进行报告也不会受到处罚。此外,不论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都缺乏对进行报告的实质性支持。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所担负的职责与所获得的支持明显不对等。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意味着可能需要参与后续的取证甚至诉讼等法律程序,极大增加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量。但是,社会工作者既不会从中获得实质性的补偿,也不会获得机构、社区等方面的认可,甚至有可能面临被报案家庭的起诉。

从制度实施看,缺乏对责任主体的培训与支持。具有报告意愿的社会工作者有可能缺乏辨别儿童虐待的能力,或不了解进行报告的方法与程序。由于制度设计与实施上相关要素的缺乏,社会工作者是否进行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自主性和专业使命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制定地方性强制报告政策的6个城市中,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明显更强。这表明,当一项法律法规或政策从中央政府传递到地方政府时,如果地方政府专门为其制定了本地化的配套规范,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资源适配和更佳的执行效果。这不但验证了国外研究的相关结论(更加清晰、具体的法律规范能够提高报告率)(Brosig & Kalichman, 1992);同时也同有关政策传递以及采纳的研究结论形成呼应(刘庆河, 2020)。

(二) 报告途径与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

各项法律法规均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遇到侵害儿童权益的情形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但是,本研究却发现,在选择报告的485次情形中,只有47次报告给公安机关,实际报告率不到10%。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并不倾向于向公安机关报告。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工作者更倾向于通过非正式途径进行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科层制的反功能。虽然社会工作者在大多数时候不在科层制系统内,但强制报告制度所要求的报告对象却是系统内的公安机关。科层制的设置本来是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但刚性的科层制设置与制度规范反而有可能促使社会工作者避免正式途径的直接接触,更倾向于采取非正式途径。

同公安机关直接接触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后续责任以及复杂的参与程序。社会工作者同督导、社区接触最多,向督导和社区进行报告的成本和难度比较低。此外,社会工作者的大多数报告对象选择都是民政系统内的不同主体(包括本机构的督导、社区以及民政部门等)。由此可见,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儿童保护所要求的多部门协作还需要更加实质性的、可行的推行方式。

其二,社会文化对公权力干预家庭私域的抗拒。儿童保护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公权力通过对家庭私域进行干预来保护儿童,其主要理论渊源来自国家亲权与儿童权利。不过,这两项理论都是基于现代西方个人权利与价值视角的预设,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本土化。

在传统儒家的社会建构中,国家把大量的自治权力赋予宗族和家庭。^①在这样的结构下,国家权力倾向于不对家庭事务进行干预;同时,还伴有父母亲权的显著扩张,以及社会文化对家长体罚权的认可(Qiao & Xie, 2017)。对发现儿童虐待情形的社会工作者来说,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并不需要干预,另一方面可能并不会报告给代表公权力的主体(公安机关)。他们可能会认为,同公安机关打交道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其他主体(如机构、社区等)可能更适合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① 对家庭的服从与对国家的服从具有线性关系。比如,《论语》中所论述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表明,子女对父母服从的“孝”与个人对国家服从的“忠”为线性的遵循状态。

(三) 相关政策建议

本研究表明,在儿童保护(尤其是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实施中,相关政策实践需要进一步体系化。如果缺乏配套支持,单独的强制报告要求难以产生效果。与此相对应,当社会工作者等相关人员在感知到明确且足够的支持后,才有可能更好地承担起专业职能。

具体来看,在政策设计上要使强制报告责任人的权责对等。报告不应只是义务与负担,而应该为包括儿童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相关责任人赋能,使他们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同时,要拓展报告途径,降低强制报告责任人的报告成本。从报告途径看,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做法。此外,在拓展报告途径的同时,要建立不同参与主体之间更为紧密的联动。

此外,在出台地方性强制报告制度的城市中,社会工作者的报告倾向明显更高。这表明,具有地方细化配套政策以及资源支持可以产生更好的实施效果。如果有更强有力的支持,相关责任主体(如社会工作者等)会更好地履行儿童保护的职责。

本研究发现,现有社会工作的学历教育对提高报告率并无特别大的作用。究其原因,现有社会工作教育有关儿童保护的专业内容相对不足,难以在此方面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认知与行为水平。此外,本研究还验证了态度自主性对进行报告的作用。这表明,除了从知识层面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儿童保护认知外,从态度层面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同样有助于儿童保护的发展。

最后,在社会文化的倡导上,既要厘清家庭私域的边界,也要认识到在儿童保护中公权力进入家庭私域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对与儿童会发生接触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其专业性无法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割裂。因此,需要在充分认识干预行为正当性的基础上,通过后续干预为儿童与家庭提供帮助,从而使儿童保护系统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充分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权利。

参考文献:

- 何玲 2019,《儿童性侵害与解决对策研究——基于 2013—2018 年的相关数据》,《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 2 期。
- 刘畅、袁易卿、孙中伟、何雪松 2020,《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设计、实施与样本描述》,《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刘河庆 2020,《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社会》第 4 期。
- 尚晓媛、田甜、谈子敏 2019,《他们为什么不说话:性侵犯受害儿童自我揭露的实证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尚晓媛、张雅桦 2008,《儿童保护制度的要素缺失:三个典型个案的分析》,《青年研究》第 5 期。
- 佟丽华 2019,《预防和处置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难点与对策》,《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 2 期。
- 谢娜、蔡迎旗 2017,《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求助及其承接问题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 2 期。
- 杨志超 2014,《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重庆社会科学》第 7 期。
- 2017,《加拿大儿童保护制度演进的基本导向及启示》,《宁夏社会科学》第 6 期。
- 2018,《我国儿童虐待救济法制的完善路径——基于构成要素的比较及法律特征的探析》,《青年研究》第 4 期。
- Ashton, V. 1999, "Worker Judgements of Seriousness about and Reporting of Suspected Child Maltreatment." *Child Abuse & Neglect* 23(6).
- Brosig, C. L. & S. C. Kalichman 1992, "Child Abuse Reporting Decisions: Effects of Statutory Wording of Reporting Requirement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3(6).
- Davidov, D. M. et al. 2012, "Nurse Home Visitors' Perspectives of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ren's Exposure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o Child Protection Agencies." *Public Health Nursing* 29(5).
- Evetts, J. 2013, "Professionalism: Value and Ideology." *Current Sociology* 61(5-6).
- Fang, X. et al. 2015, "The Burden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3(3).
- Feng, J. & M. Levine 200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urses' Intention to Report Child Abuse: A National Survey of Taiwanese Nurses." *Child Abuse & Neglect* 29(7).

- Flaherty ,E. G. et al. 2008, "From Suspicion of Physical Child Abuse to Reporting: Primary Care Clinician-Making." *Pediatrics* 122(3) .
- Fraser ,J. A. et al. 2010, "Factors Influenc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Recognition and Reporting by Nurse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7(2) .
- Goldman ,J. D. G. & U. K. Padayachi 2005, "Child Sexual Abuse Reporting Behavior by School Counselors and Their Need for Further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 64(4) .
- Gunn ,V. L. et al. 2005, "Factors Affecting Pediatricians' Reporting of Suspected Child Maltreatment." *Ambulatory Pediatrics* 5(2) .
- Haj-Yahia ,M. M. & S. Attar-Schwartz 2008, "Attitudes of Palestinian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Israel towards Reporting of Suspected Cas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3(4) .
- Hall ,R. H. 1968,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1) .
- Hawkins ,R. & C. McCallum 2001, "Effects of Mandatory Notification Training on the Tendency to Report Hypothetical Cas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Abuse Review* 10(5) .
- Karasek ,R. et al. 1998, "The 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 An Instrument for Internationally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Psychosocial Job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3(4) .
- Kenny ,M. C. 2001, "Child Abuse Reporting: Teachers' Perceived Deterr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5(1) .
- Kenny ,M. C. & A. G. McEachern 2002, "Reporting Suspected Child Abuse: A Pilot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Counselors and Principal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1(2) .
- King ,G. et al. 1998, "The Effects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 Training , and Attitudes on the Lifetime Reporting Practices of Mandated Reporters." *Child Maltreatment* 3(3) .
- Lee ,I. S. & K. J. Kim 2018,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andatory Child Abuse Reporting Attitudes of Pediatric Nurses in Korea." *Journal of Forensic Nursing* 14(1) .
- Leighninger ,L. 1978, "Professionalism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Substance and Structur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ork* 5(2) .
- Liljegren ,A. 2012, "Pragmatic Professionalism: Micro-Level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5(3) .
- Qiao ,D. P. & Q. W. Xie 2017,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ld Physical Abuse in Beijing."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2 (1) .
- Rechard ,O'Toole et al. 1999, "Teachers' Recognition and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A Factorial Survey." *Child Abuse & Neglect* 23(11) .
- Vincent ,J. et al.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4) .

作者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兵

dimension of social empowerment only has influence on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mong young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 , 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well-educated young people are sensitive to the rights”.

Keywords: Young People Social Quality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al Level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Wang Peipei(34)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8 ,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regar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opennes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neuroticism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whil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conscientiousness , extraversion and agreeablenes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openness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young females’ occupational status , while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neuroticism onl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young females’ occupational status; through accumul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openness could also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young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Henc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ity education towards young people , and cultivate their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s through multiple ways.

Keywords: Personality Traits Occupational Status Young People Openness Neuroticism

The Study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among Chinese Working Youth Xu Ji & Zeng Ni(43)

Abstract: Regarding the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 it not onl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young people’s professional quality , but also provides the new way of online learning for training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in 2018 ,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re exis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among Chinese working youth group; the frequency of online learning among working females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working males. Moreover , we try to analyze the moderation mechanisms for narrowing gender digital divid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 namely importance perception , promotion satisfaction and educational level. However , these three mechanisms couldn’t effectively bridge 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the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level also enlarges the gap in the frequency of online learning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 According to further analysis , we find that the marital status and parenting status are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to cause this contrasting phenomenon. Hence ,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narrow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Working Youth Online Learning Educational Level Gender Digital Divide

The Child Social Workers’ Child Protection Reporting Inclination Tan Zimin , Tian Tian & He Xuesong(54)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Chinese Social Work Longitudinal Study” in 2019 ,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hild social workers’ child protection reporting inclination ,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reporting inclination and the child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ism.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for the child social workers , the proportion of child protection reporting is relatively lower; there exists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porting inclination and child social workers’ working years and ages; the social workers with social work certificates have stronger reporting inclination; the higher the social workers’ work autonomy , the stronger the reporting inclination; the stronger the social workers’ sense of professional mission is , the stronger the reporting inclination; in the cities implementing mandatory reporting policy , the social workers’ reporting inclination is strong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social workers’ child protection reporting inclination and their professionalism , which provide the related evid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for child protection.

Keywords: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Child Protection Child Social Workers Reporting Inclination